

夏
衍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夏 衍 近 作 (二)

杂 碎 集

四 川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八三年·成都

责任编辑：徐 靖

封面设计：曹辉禄

杂 碎 集

夏 衍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渡口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5.875 插页 5 字数 99 千

1983 年 9 月第一版

1983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8,700 册

书号：10118·757

定价：0.54 元

出 版 说 明

这是夏衍的一本新作。共计二十三篇。其中有他对如何提高电影创作质量，发展电视的独道见地；有他对含冤而死的革命家和战友的追思；有他从事创作的片断回忆；还有他为作家、艺术家的著作写的序言。虽然题材不一，内容各异，但每篇都有史料价值。戏剧和电影工作者以及从事于文学的研究者，从中可以受到启迪和教益。

自序

翻翻英文词典，就会看到 chop-suey 这个怪字，它是中国话“杂碎”的音译，意思是“什锦饭”或“炒什锦”。我为了好奇，在西菜馆试尝过一次，原来就是上海的“盖浇饭”，即在米饭上加一点肉丝、青菜之类的“浇头”而已，这是一种廉价的“中国菜”，但有一次我在一家瑞士高级餐馆的菜单上，却看到过“李鸿章杂碎”这样一味名菜，这大概是供高级洋人品尝的中国菜吧。现在，中国菜馆，普及到全世界，鱼翅海参，乃至满汉全席都有，“杂碎”这个名称，大概不久就会消失了吧。

四川人民出版社曾出版过一本我的“近作”。去年冬，他们又约我编近年来写的文章，叫它“近作二集”吧，那就得“三集”、“四集”地出下去，可是想了好久也想不出一个恰当的书名，再翻阅了一下那些文章，觉得又杂又碎，

于是就想起了“杂碎”。有人说不如用“什锦”，那就带点广告性了，因为这些东西大部分都是逼出来的急就文章，什而无锦，最多也只能说是中档品，用“什锦”，就不免过誉了。

这个集子里的大部分文章，都是报刊编辑逼出来的，其中一部分书简，也是认识或不认识的朋友“催”出来的。我这个人做了半辈子的统战工作，五湖四海，九流三教，认识的人不少，经过十年内乱，一位朋友去世，或者平反昭雪，编者就会要我写点悼念文章，我长期在文艺界打杂，于是文艺团体开会闭幕，出文集，会有人逼着我写稿。催和逼，“文革”之前，我是不怕的，可是年逾八旬之后，接到“务请×日前交稿”、“已给你留了×千字的版面”，乃至“过了期编辑部要被罚款”之类的函电，我的心情就不是愉快而是苦恼了。我看过一幅题为“老正兴”的漫画，是讽刺报刊编者看不起青年作家，专登老作家的作品的。事实上，这种现象是常有的，我假如来者不拒，有求必应，那么这个集子的篇幅会增加一倍、两倍吧。我想，现在是“老正兴”出盘或者停业的时候了。

这些又杂又碎的东西大都写于一九八一年以后，长短不一，涉及的面又杂，所以很难按写作年月或内容性质来编排，我只粗粗整理了一下，把序跋、书简、怀人和有关电影的分别拼凑在一起，其余的，只能让它当拼

盘了。在书简这一辑中，除了“签友人书”一篇在《上海文学》上发表过之外，都是没有发表过的底稿，文责自负，不再征求受信者的同意了。

一九八三年春 时年八十有三



作者一九七九年九月在医院里

目 次

自序.....	1
《文坛繁星谱》序.....	1
《中国现代戏剧电影艺术家传》序.....	4
《学人谈治学》代序.....	6
《蜗楼随笔》自序.....	11
重读《创新独白》.....	15
《于伶戏剧散论》代序.....	24
《夏衍论创作》自序.....	29
中国文联四届全委会二次会议开幕词.....	32
对目前电影创作的一点看法.....	38
提高电影质量的关键在领导.....	46

电影工作者要加强学习·····	49
希望有更多独特风格的好影片·····	55
希望有财贸题材的好影片·····	60
答《戏文》编者问·····	63
应该重视电视这一传播工具·····	72
改进电视系列片《西游记》·····	79
无题的对话·····	81
迎春寄语·····	87
答友人书·····	93
关于笔名·····	117
有关左联的几件事·····	124
关于诗·····	127

关于评论·····	132
莫听“小道”·····	134
纪念潘汉年同志·····	138
悼金山同志·····	151
不能忘却的纪念·····	154
迎新忆旧·····	158
赞颂我的“老大姐”·····	161
杂文复兴首先要学鲁迅·····	165
故乡之忆·····	169
广州赞·····	174

《文坛繁星谱》序

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七九年十月在北京召开。这次代表大会和一九六〇年举行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相隔了一十九年。在四个全国性的人民团体中(工、青、妇、文)，文联当了殿军。一般人都说文艺界的十年浩劫始于一九六六年，事实上这场浩劫的序幕早在一九五七年就开始了。这说明文艺界受到林彪、康生、“四人帮”的迫害，时间最早，损害最大，而重整旗鼓、恢复自己的组织，则在“四人帮”被粉碎了三年之后。在周扬同志、阳翰笙同志发言中列举了一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文艺工作者的名单——其实这些名单只是文艺界较有声望的同志，我们还不能准确地统计出一个全部受害者的数字。一九七八年五月文联召开第三次全委扩大会的时候，我们还希望熬过了十年灾难

的文联主席郭沫若同志能再次主持这次盛会，可是，他和不少老一代作家如阿英、冯雪峰同志没有等到这一天，就离开了我们。这次代表大会的名额从原订的二千五百人增加到三千人，其目的就是为了让劫后余生的老一代文艺工作者，和二十年来受过不公正待遇的中年文艺工作者，以及近三年来崭露头角的年轻的文艺工作者能有相聚一堂的机会。因此，我认为，摄影家协会把这次会议的一些场景拍摄下来，收集成册，是很有纪念意义的。

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人在这次会上，都曾有过相似的感受，就是在会场上和休息室常常碰到似曾相识而又叫不出姓名的朋友，直到相互自报家门，才知道是相隔十几年乃至二十年未曾见面的战友。有些人两鬓皆霜或满头白发，有些人拄着双拐或坐在手推车上，心情愉快地来参加会议。在这种场合，我奇妙地想起了龚自珍的《病梅馆记》这篇象征性的文章。但再琢磨一下，觉得《病梅馆记》所说的情况和作者所象征的情景，和我们的遭际有很大的不同。使龙蟠、邓尉、西溪之梅“皆病”的，是文人雅士，而使我们文艺界遭到灾难的却是一批目的在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恶棍。病梅还可以“疗之、纵之、顺之，毁其盆，悉埋于地，解其棕缚”等方法，使之复苏，龚自珍预期的治梅期限也只是五年，而我们文艺界的情况，为了“解其棕缚”“毁其盆”就已经花了三年多时间，看来

使我们真正做到“百花齐放”，恐怕需要更长的时间了。

在这本画册中，可以看到，从五四时期、三十年代以来的一些年近或年逾古稀的文艺工作者，他们无一例外地遭到了封建法西斯的残酷迫害；大量的有成就的中年文艺工作者也受到了诬陷和打击，但是，他们都没有在暴力与重压之下屈服，保持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固有的节操。当然，也有极少数的例外。我认为，这是中国文艺工作者值得自豪的品德。我们常常听到“能够活下来看到今天就是胜利”、“要以有限的有生之年，夺回十年来的损失”这样的壮语。巴金同志曾充满感情地倾吐过的“噩梦醒来，人已衰老，但我要抓紧时间，抓紧工作，我要奋笔写下去”这一段话，形象地概括了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的心声。当然，我们是乐观主义者，我们看到老一辈艺术家还在辛勤地工作，那些遍体创伤的中年一代就在这短暂的时期内，已经写出了不少优秀的作品。特别使我们高兴的是，我们有了一批新的闯将，他们之中有工人、农民、战士、科技工作者、教师和学生。他们敢于解放思想、冲破禁区、面对现实、独立思考，为文艺界带来了三十年来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我们坚信，群星灿烂的我国文艺复兴在不久的将来必将出现。

“中国现代戏剧电影 艺术家传”序

在我们睿智的祖先遗留下来的文化宝库中，自汉代的《史记》到后世各代的文苑传、文艺传、文学传，直到元代的《录鬼簿》等，穿起了一串传记文学的珠宝。《史记》记载了汉兴以来“百年之间，天下遗闻古事”，评说了“明王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以致两千年的今天，我们仍能从《史记》中记取历史的经验教训，这不能不感谢司马迁对民族文化的伟大贡献。元代的《录鬼簿》，虽则简疏，却也从保存文献资料的角度，记录了“已死未死之鬼”——戏剧艺术家们的传记和他们对戏剧的贡献。编者钟嗣成的意图也在使人们“千万载之下，知其为何人”。

这种史传文学的基本建设，是我国文化事业不可缺

的组成部分，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建国后的十七年间，我们虽然做了一些这方面的基本建设，但因为那些年事繁变剧，未能有组织有系统地进行。“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灭社稷之栋梁，废天下之文史，制造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空前的浩劫，史传文学的编纂工作更是无法进行，致使传记碑下铺满了枯枝败叶，文史园里萧艾取代了芳草。

令人欣慰的是，北京语言学院的几位教师，在百废待兴的时刻，首先想到了为广大受林彪“四人帮”迫害的戏剧、电影艺术家树碑立传。他们在教学工作之余，以高度的责任感和饱满的热情，为抢救祖国的文化财富，为拨乱反正，担负了庞大的组织工作和繁重的撰写任务。经过他们和艺术家们的共同努力，《中国现代戏剧电影艺术家传》第一辑和读者见面了。它为我们的百花园地增添了一束鲜花。当然，好花需要爱花和护花人的关注和扶持。让我们大家都来关心史传文学的基本建设，都来做穿珠拭玉的工作。

《学人谈治学》代序

《浙江日报》为了鼓励青年认真学习，相继开辟了《勤学佳话》和《治学经验一席谈》两个专栏，介绍古人勤学成才的故事，发表了当代国内专家、学者撰写的几十篇治学体会文章，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现在，把这些文章汇编成书，题为《学人谈治学》，无疑是对建设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有益贡献。在付印之前，编者要我写篇短文，作为此书代序。我算不上“学人”，也没有系统的治学经验，但一则是“君自故乡来，不忘故乡事”，不好推辞；二则在四、五十年的工作、学习过程中，也还有一些自己的切身体会。因此，只能在各位前辈和乡长前面，班门弄斧，讲一点很不成熟的意见。

近年来收到不少青年的来信，也从报刊上看到许多青年作者的文章，使我得到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印象，就